

2010年8月，喬姆斯基(Noam Chomsky)訪華，自然掀起了一陣旋風。在這陣旋風中，公共知識份子以及知識份子中左中右各派的特質、主張及其社會角色等問題，又在中國媒體上引發一陣議論。本刊歡迎海內外作者，就與此相關的話題，展開深入的討論。有關投稿將優先刊載。

——編者

知易行難的新聞自由

曹立新的〈抗戰時期新聞管制與報人言說〉(《二十一世紀》2010年8月號)一文最有價值之處是作者揭示了國民黨政權之所以不遺餘力地實行新聞高壓的政策，乃在於企圖借箝制輿論以實現意識形態控制，確立三民主義「黨義」的絕對話語權。試想，在一個一黨專政、黨國一體的國家，當政者怎麼會願意真正開放新聞自由，或有足夠雅量傾聽異己的尖銳批評呢？因此，新聞自由必須建立在民主政治的基礎上，只有承認多元化的合理性，允許不同政見者的存在，才有可能容忍不同的聲音，否則無異於與虎謀皮、緣木求魚。不過，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來看，恐怕知易行難。

或許是限於篇幅，曹文對涉及的一些史事僅點到為止，如文中所述抗戰初期國民黨新聞統制政策曾經一度緩和，其實頗值得多費些筆墨。因為這種鬆動一方面是緣於時局的變化，另一方面或許也正是對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京大學新聞討論周之類籲請的響應，乃國民黨新聞政策演變的關鍵節點。

盧毅 北京
2010.8.20

主義思想類課程的危害

王則柯〈主義思想類課程退出必修課系列〉(《二十一世紀》2010年8月號)一文，通過對主義思想類課程設置的弊端以及對於其退出大學必修課的路徑之探索，反思了當今大學辦學自主的問題。

近年來，不少有識之士反思這六十年的教育成果，認為縱向比較不如民國，橫向比較更是遠落後於世界先進。這種現象歸根到底還是因為當局對於教育干涉太多，導致大學自由精神和創造力的喪失。作者指出廢除這類課程的最大阻力來自於主管意識形態的官員。他似乎認為，只要官員意識到這類課程的危害，廢除這類課程便是理所當然的。

對此，筆者不敢苟同。進入1990年代之後，當局突然重新加強了對於大學教育的干預，這顯然是出於政治的深遠考慮。這類課程的設置其實有

兩個目的：一是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進行思想灌輸，設置思想禁區；另一是加重學生課業負擔，事實上中國大學生的課業負擔之重遠超過西方民主國家。顯然第一個目的已失效，這類課程的意識形態功能基本上喪失殆盡了，這幾乎是整個社會的共識，但是為甚麼這類課程仍然得到維持，顯然第二個目的仍然有效。大學生埋首於功課之中，自然無暇思考和關注政治與社會問題。

筆者認為，要想重新激發大學生的自由思想和創造力，當務之急是社會各界共同爭取逐步恢復大學辦學自主權，減輕學生的課業負擔。到那時，主義思想類課程退出大學必修課自然水到渠成。

劉洪強 北京
2010.9.3

對中國當代藝術批評的價值詰難

魯明軍〈中國當代藝術的「後現代批判」質疑〉(《二十一世紀》2010年8月號)認為種種「後現代批判」都有其現實針對性，但批判的背後，卻又不知何去何從。在經濟全球化的當今

世界，文化雜交(Cultural Hybrid)已然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魯文對當代藝術的各種「後現代批判」進行質疑是有意義的。

文章指陳批評家缺乏對西方理論的整體觀照，而往往在沒有澄清其本來面目的情況下，不加檢省地接受並予以無限的放大，從而容易陷入無所適從的精神荒漠和價值真空。筆者同意魯明軍的觀點。

以東方主義為例，它並不是西方對一個確定目標，即東方的外部凝視。它是西方對東方的想像和構建，並非為了理解東方，也不等於東方對自身的理解。問題的關鍵是，我們現在是否還需要別人來再現，我們能否再現自己？

後現代主義往往以否定的方式展開批判，最終難免也否定了自己，表現為一種找不到出路的虛無主義。魯文關注中國當代藝術的「後現代批判」，批判其隱含的價值虛無傾向，可謂「批判的批判」。這有助於我們對當代中國藝術批評保持一種清醒的學術批判眼光。

黃林非 長沙

2010.9.4

解決大學「官本位」的問題

筆者十分認同熊丙奇的〈大學取消行政級別的阻力與路徑〉(《二十一世紀》2010年8月號)所說：高校行政級別的最大弊端在於強化政府對於大學的管理，並增強高校領導的官員定位與官員意識。但是，將教育部直屬高校作為取消大學行政級別的試點，這種改革路徑與辦法很難達到預期效果。

教育部直屬高校，所有公

辦大學的辦學經費都主要來自政府的財政預算。如果這些大學不能在財務上獨立於政府，那麼無論取消高校的行政級別與否，勢必都會受到政府干預。從這點上來說，高等教育問題的癥結在於政府對大學干預的邊界不明，並且干預不是經由制度化的機制來實施的。

對於解決大學「官本位」的問題來說，取消高校行政級別不僅無關宏旨，而且推行起來效果也未必會好。相比之下，以下三項工作才是政策更應關注的重點：第一，應該向國內外真正開放高等教育市場，並讓私立與公立大學在生源與辦學經費上能夠相對較為公平地競爭。在此情況下，那些繼續死抱着「官本位」理念不放的高校要麼主動做出改變，要麼就被無情地淘汰。

第二，大力改革高校內部的治理結構，改善大學內部的民主氛圍。例如大學黨委在學校內部主要負責思政與黨建工作，不干預日常的行政事務。在選聘校、院、系三級的主要領導時，引入公平競爭與民主選舉的辦法。此外，通過制度化與組織化的方式提高學生和基層教職員工對於學校事務的話語權與監督權，使得大學不再是少數領導的「地盤」。

最後，政府應該致力於改善自己與整個社會對於大學和知識份子的尊重程度。大學很難影響政府，大學老師的地位和待遇也不如公務員。將整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從金錢至上、權力至上轉變為知識至上，這不僅是政府的道德職責所在，也事關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成敗。

盛思鑫 悉尼

2010.8.22

挽救墮落中的中國大學

張鳴在〈廿年中國大學之殤〉(《二十一世紀》2010年8月號)一文中對目前中國大學弊病的揭示讀來讓人哀嘆。除了張鳴所揭示的問題之外，當前中國大學之殤的另一最突出體現在於「無智化」。就拿大學的學術評價來說吧。大學最本質的東西是「學術」，然而一個學者的學術水平如何，當前中國許多大學的主要評價標準是看其學術成果發表的刊物是不是被某個機構收錄的「核心期刊」。至於這個所謂「核心期刊」的質量到底如何，根本不管不顧。未被某機構收錄為「核心期刊」的刊物，無論其學術聲譽如何，都劃入低等刊物，凡被冠以「核心期刊」的刊物就身份倍增，凡在「核心期刊」上發表的文章就有學術質量。對於許多身披「核心期刊」外衣的垃圾刊物，熟視無睹。這是大學管理者不敢相信自己的頭腦，還是不屑於相信自己的頭腦？大學無智至此，怎麼談得上學術？怎能談得上高等教育？

如何挽救墮落中的中國大學，張鳴開出的方子是：開放辦學，鼓勵興辦教會大學，讓教會大學的公益特質「有效地抵禦來自資本和官方的謀利傾向」。大學的「開放」或者「放開」是必要的，但僅憑此一途想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似乎是不現實的。面對當前問題重重的大學，需要多管齊下，比如允許大學教師的自由流動。

李巧寧 漢中

2010.8.20